

书里书外

就这样，他成了袁隆平

写作《袁隆平传》，是一个传记作者的幸运，也是一种莫大的压力。袁隆平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、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饥饿拯救者、粮食生产保障者，半个世纪以来，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符号。要写出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的科研精神之原动力，写出他以普通人的姿态活于尘世之中的丰富鲜活，并非易事。

当初出版社上门恳请袁隆平授权写作一本他的传记，他习惯性地挠挠头：“我这一辈子平平淡淡，没有什么好写的。”语气真诚而直接，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平淡，这和公众对他的认知完全不一样。我在想，袁隆平何以能在世间喧嚣的喝彩声中独辟一方宁静的心灵世界，而且如此超过了半个世纪？

采访、写作《袁隆平传》近6年时间里，我越来越感受到：袁隆平壮阔的一生，就是不断解决各种“矛盾”的一生。这些矛盾，不是对立，不是遗憾，而是一种深刻的选择：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，选择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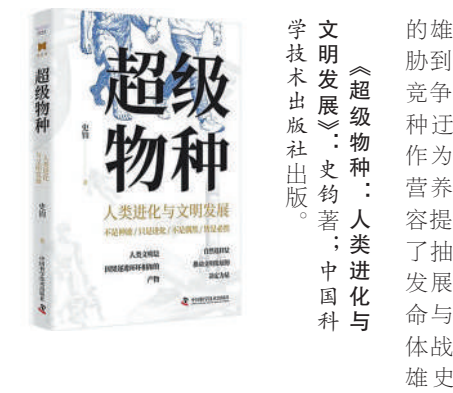
写作人物传记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笃信，一个人最动人之处，往往藏在他的矛盾里。袁隆平的矛盾，让人感慨，亦让人深思细品。

爱天下人，却错过父母最后一程

1974年尾，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病重住进医院，那时袁隆平正在海南三亚攻关三系杂交水稻的关键环节——“制种”难关。他的妻子邓则接到电报后赶往医院，袁兴烈得知袁隆平在海南攻关，叮嘱邓则：“不要叫他回了，国事大，家事小，让他安心工作吧。”于是，一家人都对袁隆平隐瞒了父亲的病情。1975年1月，袁兴烈过世，袁隆平就此错过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。

15年后的1989年9月，袁隆平的母亲华静在湖南安江病危，得知消息时，袁隆平正在长沙一个有关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现场会上，他把会议开完就匆忙往安江赶，到了医院袁隆平才得知，在他赶回的途中，母亲已经过世。60岁的袁隆平当场痛哭失声，因为与母亲永别，因为未能与母亲说上最后一句告别的话。

父母辞世均不在场，听起来袁隆平似乎薄情，但实际上，他内心有着一份强烈的爱。因为这一种爱，所以在年轻时经历了饥荒，看过了饿殍后，“让天下人吃饱饭”“让粮食增产、再增产”成为他的信念。他的研究笔记



八九年前，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人类学图书，不少都采用西方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，东方文明在书写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。而人类文明是东西方文明以及全世界其他文明融合互通的结果，因此我开始收集资料创作《超级物种：人类进化与文明发展》，并在写作过程中有意强化了东方视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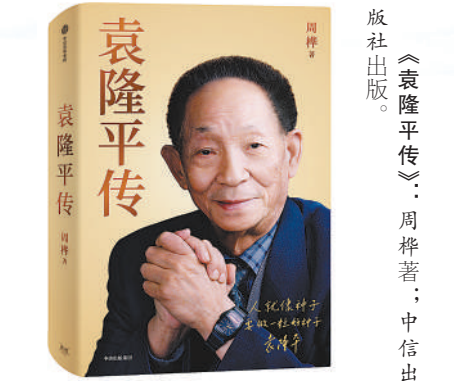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理解中的文明，是社会能力的集中展示，包括文字记录能力、艺术表达能力、知识总结与传承能力和系统的社会管理能力等，各种因素融合的成果就是文明。问题在于，地球上的生物漫山遍野、无以计数，有些出现的时间甚至比人类还早，为何独有人类发展出了繁花似锦的现代文明？

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本书以刚果河北岸为起点，从人猿分离的那一刻开始，全面回顾人类文明的跃迁进程，探寻人类最终成为“超级物种”的辉煌历程，进而从自然选择的角度，剖析人类的生物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，以阐明人类文明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

究其本质，人类仍然是一种动物，生存的根本目标在于获取食物与配偶，此即古人所谓“食色性也”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人类结为群体，在有限的地盘上展开了无休止

书里书外

就这样，他成了袁隆平



里，他的公开演讲中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“吃饭问题”。在袁隆平看来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科学技术问题，这是人的尊严。一个人，如果连饭都吃不上，何以谈人生？

如果说袁隆平的人生有什么事从未缺席和迟到过，那就是每一年的杂交水稻育种试验，以及每一天和稻田的“约会”。这种“我必在有限”的坚持，背后就是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的信念在支撑。而这信念几十年如一日，乃是因为爱人民、爱国家、爱民族，因为爱，所以迫切希望为他们解决最根本的问题：饭碗、粮食。

这份爱之大，让他不自觉放弃了一些亲情之爱，比如与父母最后的告别。他的爱，从来不是不够多，而是足够大，远远超出了一个家的边界。

散漫生活，偏执工作

袁隆平自我总结“自由散漫”。他的确不喜欢被约束，礼仪场合能简则简，拒绝繁文缛节。结婚前邓则第一次去他的宿舍时，眼前一片凌乱，“墙角边还丢了几双我的臭袜子”，袁隆平回忆说。

散漫的袁隆平非常热爱生活。他喜欢打麻将，打得很认真，输了会懊恼，赢了会高兴；他从年轻时就热爱音乐，爱唱歌，大学时学会拉小提琴，一拉就很久；他还擅长游泳，拿过川东区游泳第一名，甚至在嘉陵江里救起过溺水的同学。

他对生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热情，他要让日子好玩。但就是这个散漫的、充分享受生活的人，却做出了一件极其需要偏执才能做成的事。

1964年，袁隆平开始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株——这是杂交水稻育种的关键基础材料。许多农作物雄性不育株有一个共同特征——花药不开裂，袁隆平决定将此作为寻找天然

的雄性竞争，这些竞争反过来又威胁到了群体的稳定。为了缓解过度竞争、维护群体稳定，人类采用了多种迂回策略，狩猎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狩猎的伴生效应，早期人类的营养状况得到大幅改善，为大脑扩容提供了可能。大脑的进化又驱动了抽象思维能力，为语言和艺术的发展奠定基础，进而触发了农业革命与宗教革命，这又为大规模的群体战争铺平道路。此后，宏伟的英雄史诗，开始在各种文明中反复上演。

这一切并非线性的演进过程，更像是在原野上流淌的河流，使得人类文明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。其中，维护群体稳定始终不同社会的主要任务，并由此衍生出了其他社会特征。比如“从夫居”现象，也就是女性嫁到男性家里的现象，就与其他哺乳动物存在明显差异。从人类学角度来看，“从夫居”弱化雄性竞争，维护群体稳定，这样才有机会在大规模的群体战争中取得胜利。基于这一逻辑，书中重点辨析了群体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影响。群体战争的作用方式最为直接，效果也最为强烈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社会制度。

以亚欧大陆为窗口，全书力图全景梳理人类文明进化的总体框架。幸运纬度上的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部落的千年“羁绊”是故事的关键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超越是故事的续集，人工智能则在隐约暗示着人类的未来。感谢幽深的时光黑洞，没有吞噬所有的故事情节，也没有斩断所有的逻辑链条，让我们得以穿过漫长的岁月通道，了解人类文明进化的瑰丽征程，并在书中回到从前、浏览过去，同时展望未来。

雄性不育株的突破口，按图索骥，靠人工肉眼在茫茫稻海中寻找。他其实知道，这种后来被称为“C系统”的不育株，存在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，要把它们找出来几乎就是大海捞针。

但袁隆平居然就捞到了这根针！在开始寻找后的第十四天，他找到了一株“洞庭早粳”品种的雄性不育株。过万株的水稻，袁隆平逐株检视，在随时可能被稻芒划伤的田里，蹲下去、看、记录，再蹲下去……连续14天，每天他都是天不亮就起床，草草吃饭，带上两个馒头就到稻田，一直到下午4点后才收工。

在采访时，面对这些回忆中的细节，我偶尔会想：这和那个打麻将的、唱歌的、拉小提琴的自嘲为散漫的人，是同一个吗？但很快我就有了非常确切的答案：当然是！而且这两面彼此成全：正因为袁隆平在生活里足够松弛，他才能在需要偏执的时候，把全部的专注力凝聚起来，做别人眼里不可能的事。

真正热爱一件事的人，不需要用纪律来约束。对袁隆平来说，下田和拉琴其实是同一件事：全神贯注，用心生活。

缺席儿子的成长，却是学生眼中的“父亲”

袁隆平有3个儿子，但因为忙于工作，他没有像大多数父亲那样陪伴、培养自己的孩子们。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在国际农业科学界都属于开创性的事，袁隆平作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，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。

大儿子由袁隆平的父母带大；二儿子跟着袁隆平和邓则的时间稍多，算是三兄弟里与父亲相处最多的一个——但“最多”，也是相对而言；小儿子则是在邓则母亲的陪伴下长大，父亲于少时的他，更像一个偶尔出现的客人，他记得自己幼时经常问母亲和外婆：“爸爸呢？”得到的回答总是“种稻子去了”。以至于小儿子袁定阳小时候心里有一个“有钱爸爸”的想象，因为有钱才有很多田，有很多田所以总种不完稻子。

在儿子们的学业和工作方面，袁隆平也没有太多关注和帮助，几个孩子都是自我摸索自我成长。他的学生谢长江记得自己偶尔还要代表袁隆平处理孩子的学业事宜。“谢长江，你帮我跑一趟，我实在抽不出时间。”他总是对谢长江扔下这么一句话，就忙自己的事去了。

不过，另一边，他的学生们却有另一番

记忆。

袁隆平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谢放鸣在毕业后先是做了袁隆平的助手，但袁隆平觉得谢放鸣潜力甚大，于是为他争取了美国的生物学奖学金名额，将他推荐到了康奈尔大学读博深造。谢放鸣后来成长为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，应该说与袁隆平当年的全力托举不无关系。

类似的例子非常多，袁隆平总表现得比学生自己还爱惜他们的“羽毛”。曾经他的博士研究生吴朝晖的单位有意安排他去做行政工作，袁隆平非常着急，觉得这样很浪费吴朝晖的科研才能。在生前最后一次见到吴朝晖时，袁隆平反复说一句话：“要多搞科研，好好搞科研。”袁隆平为学生们的考虑可谓周全又细致，他甚至为吴朝晖的婚事操心，亲自为他选定结婚日子。

有时候袁隆平让人觉得，他为学生们做的远比为儿子们做的还要多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也试图去理解这件事，我想，也许是因为他和学生共享着一样东西：杂交水稻研究。他们是同路人，说的是同一种语言，走向同一个方向。他在学生身上，能够清晰地看见事业的延续，看见那颗种子被接过去，然后往下传承。

袁隆平把“育苗”这个词，用在了稻田里，也用在了人身上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把父亲这个角色，变成了一种传承。

袁隆平的确是矛盾的，但那些“看似矛盾”的地方，其实都源于同一种人格——把有限的生命，全部倾注在一件他认为最重要、最有价值的事上。

人生最高级的矛盾，是使命与亲情、自由与责任、小家与大家之间，永远无法两全的选择。袁隆平做出了他的选择，这样的选择，让他成了他。



新书推荐

本书以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特色为切入点，提炼我国在制度根基、产业基础、市场空间、动力机制等方面的优势，帮助读者读懂中国经济的韧性、潜力和光明前景。

《大道方兴：读懂中国经济的光明底色》：李玉举、连欣著；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《烽火雁门关》：梅杉著；人民日报出版社、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以雁门关为叙事背景，以四代人的命运起伏作为主要线索，串起一个家族从清末动荡、辛亥风云到全民抗战的悲欢离合，勾勒出雁门儿女守护乡土、不屈抗争的鲜活群像。

读书

本版责编：任飞帆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本版邮箱：dushu@peopledaily.cn

莫高窟第254窟侧视图。

图片来源：《中国石窟史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

做了10多年编辑，经手的书稿不算少，但去年接到这部书稿时，我还是愣了好一会儿。不是被900多页的厚重吓到，而是看到扎实鲜活的文字和从未面世的插图时，我才发现：原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藏着一个如此庞大、如此完整的石窟世界。

石窟热，一年热过一年。敦煌一票难求，云冈游人如织，社交媒体上的打卡

攻略铺天盖地。作为一个爱凑热闹的游客，我以为自己对中国石窟很了解。直到跟着两位作者——敦煌研究院孙晓峰研究员和石窟译介学者杨香玲教授走进书稿，我才发现自己以前所谓的“了解”，只是凑热闹。那些散落在荒野深处的中小石窟，那些壁画角落里不起眼的题记，那些被风沙侵蚀得几乎看不清的早期造

刚刚过去的7月15日，是著名翻译家、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老编辑文洁若先生的百岁生日。我和同事们又一次来到文老位于北京复兴门的家中，庆祝她的期颐之寿。

过去20多年里，和文先生的接触大都是因为要出版她的译文，或者接手她曾经编辑过的图书的再版，就版权、稿件、校样、样书等事宜和她沟通。每一次去文先生家，首先看到的都是她的背影——她的书桌就紧靠着正对大门的墙边。书桌上有一盏台灯，有时候甚至白天也开着，因为她的视力已渐渐弱化。台灯以外，桌上就是外文原书与字典，还有文先生的一摞译稿稿。她的译稿很好辨认：一笔一画都很清晰，有的地方还粘着或短或长的小纸条，那是文先生将废弃不用的纸张收集起来后亲手裁剪的，在修改译稿的时候，她会根据修订内容的多少将纸条裁成不同长度。一张书桌，浓缩着她的勤勉与节俭。

文先生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：将优秀的外国文学引进、介绍给中国读者。她是译者，也是出版社编辑，日文、英文都很擅长。上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“日本文学丛书”，相当一部分就是她编辑和翻译的。1982年，人文社出版了文先生编选的《日本当代小说选》，收入了谷崎润一郎、大江健三郎、远藤周作等一众日本实力派作家的作品，光是看这份作家名单，你就不能不叹服编者眼光的精准。文先生翻译的芥川龙之介的《罗生门》、川端康成的《东京人》、松本清张的《日本的黑雾》堪称经典，她和萧乾先生共译《尤利西斯》更是成为文坛盛举。她的翻译文字素雅，意蕴隽永，朴实之中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。她获得过中国翻译协会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，却说自己这辈子，“能取得一点点成就，全靠勤奋”。

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我们有时也会闲聊一些热点人物与事件。记得是在2010年前后，有一次我们聊到了虽然已过百岁高龄、依然笔耕不辍的周有光先生，文先生兴致勃勃地说道：“我也要像周有光那样，活到100岁，干到100岁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她已是80多岁了。这不服输的劲头，让我暗暗吃惊，她瘦弱的身躯中蕴含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能量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文先生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，除了翻译。我以为，年纪这么大的老人，只会慢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很少接受外界的信息了。事实打破了我的偏见。2020年前后，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作品很受读者青睐，关于他的文章在报纸、杂志上多了起来，介绍的多是他那些知名作品。有一天，我偶然看到一篇介绍太宰治长篇小说《惜别》的文章，这篇小说在其创作中较少被人提及，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没想到，过了几天，我去拜访文先生时，她突然和我说，自己最近看了一篇文章，其中介绍了太宰治一部关于鲁迅的小说《惜别》，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本原版书，她想读一读。90多岁的文先生，仍然兴致勃勃地接受外界的信息，并从中找到继续翻译下去的动力，不能不让人感慨。

那天，给文先生过完生日，离开她的家已是正午时分。在骄人的烈日下等车时，我忽然想起，前不久给她录制视频，问她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文先生没有丝毫犹豫，脱口而出：“年轻人要趁年轻多干点活。”说完，她自己笑了起来。

在百岁老人文先生的眼中，我们都是年轻人。我想，她的这句话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许吧。

（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）



文洁若在工作，AI修饰生成素描画

刻在石头上的中国史

——《中国石窟史》编辑手记

张 科

像，也是拼出中国石窟完整全貌的重要碎片。

翻开书稿，我认真地读每一座石窟的开凿缘起，读不同朝代造像风格的演变脉络，读每一处壁画背后埋藏的历史伏笔。其中，有个细节记忆犹新：一处并不知名的小石窟中，一幅唐代壁画里竟然出现了明显的波斯风格联珠纹饰。这份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直接物证，此前未被书籍收录过。另外，我惊讶于看到家乡东北地区的多座石窟，此前竟从不知晓。鲜活的文字，真实的插图，让我了解到东北石窟体量虽小却意义非凡：它把中国石窟的版图向东推进了一大步，也记录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交往交融。

类似的发现，书中俯拾皆是。它让读者明白，中国石窟不止有“四大”，中国石窟也不只有佛。从北魏的雄浑到隋唐的华美，从宋元的写实到明清的世俗，石窟造像与壁画的每一次风格转变，背后都是朝代更迭的烙印、民族融合的轨迹、中外交流的印痕。这部书稿，就像一部用石头写成的中国通史。

在跟美编老师挑插图的时候，我最常发出的感叹是：“这个我居然没见过！”因为书稿中提到的很多石窟，连专业考古文献都未曾收录。两位作者凭借多年田野

调查的积累，把它们第一次带到公众面前。一位参与审读的老专家说，这部书稿填补的空白，比他预想的要多得多。这些图片的好，不在于数量多，而在于“活”。它们就像带着温度的历史切片：北朝供养人脸上的虔诚，唐代飞天衣袂间流动的韵律，宋人题记里一笔一画的烟火气——千年的时光被定开口在方寸之间，让那些沉默的石头真正“开口说话”了。

完成编校工作后，我脑海里蹦出一个词：“亏欠”。石窟旅游热度倍增，但不少人不过是匆匆一瞥，拍几张照片便转身离去。那些凿山开窟的工匠、耗尽一生画壁的画师，把最精湛的技艺刻进石头，托举起跨越千年的文明瑰宝。而我们面对这些瑰宝时，往往只带走了影像，未带走知识。与其说亏欠了古人，不如说亏欠了自己——亏欠自己一次真正看懂它们的机会。这本书或许能把这份亏欠补上，让那些被匆忙脚步错过的历史，重新被看见、被读懂。

这些刻在石头上的信仰、艺术与历史，是一个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。希望翻开这本书的读者，都能在沉默千年的造像与壁画前，找到与自己与历史对话的方式。

（作者为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）